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法] 朱莉亚·克里斯蒂瓦 著

刘成富 等 译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法] 朱莉亚·克里斯蒂瓦 著
刘成富 陈寒 减小佳 黄小彦 江蕾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娜·阿伦特 / (法) 克里斯蒂瓦著；刘成富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6
(不朽的肖像·女杰)
ISBN 7-5343-7400-6

I . 汉... II . ①克... ②刘... III . 阿伦特, H. (1906 ~ 1975) — 传记 IV . 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7812 号

GÉNIE FÉMININ-HANNAH ARENDT de Julia Kristeva
World copyright ©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99.
图字：10—2005—050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编：210009
网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名 汉娜·阿伦特
作者 [法] 朱莉亚·克里斯蒂瓦
译者 刘成富 等
责任编辑 管鹏鹏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销商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厂 廊坊市时嘉印刷有限公司
廊坊市广阳区旧州田古营 电话：0316-2913281
开本 940mm × 640mm 1/16
印张 15.75
字数 19.7 万字
版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4.00 元
发行热线 010-62223842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图片 1
汉娜·阿伦特，1927



图片 2
汉娜·阿伦特，1933



图片 3
汉娜·阿伦特，1944



图片 4
汉娜·阿伦特，1950

目 录



第一章 生命是一种叙事

1. 一部“如此坦呈”的传记 /7
2. 圣·奥古斯丁之爱 /28
3. “一个典型”的意义：拉赫尔·瓦伦哈根 /45
4. 阿伦特与亚里士多德：为叙事一辩 /68
5. 讲述 20 世纪 /86

第二章 高级的人类

1. 她是犹太人 /103
2. 在结构的要素之间 /115
3. 什么是现代反犹主义？ /124
4. 帝国主义…… /131
5. 恶的平庸 /143
6. 信仰与革命…… /153

第三章 思维、意志、判断

1. “谁”与主体 /169
2. 与思考的“我”对话：“缺陷”、忧郁、专制 /181
3. 人类生命进程中的暴力行为 /197
4. 观众对政治哲学的趣味 /214
5. 审判：在宽恕与承诺之间 /225

后记 /235

“某些人似乎活在自己的生命里(仅仅活在自己的生命里,而不是——比方说——活在人群里),他们如此坦呈,因而成为了生命的十字路口,成为了具体物化的生命。”^①当汉娜·阿伦特(1906—1975)写下这几行预示自己未来命运的文字时,她只有24岁。此时,她已经遇见并爱上了海德格尔,这个人的出现在她的一生中都是激动人心的。她在海德堡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论奥古斯丁的爱的观念》^②,导师正是她所信赖的那位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刚一参加研究活动,人们就发现她能够如此“坦呈”自己,以至于凝聚成了“生命的十字路口、具体物化的生命”。

年轻的女哲学家起先打算致力于神学,继而又投身于对形而上学的研究与“解构”,但是不久之后,生命成为了她思考的主要内容。首先是简而言之的生命:为了活下来,阿伦特被迫于1933年离开德国,流亡他乡以逃避屠杀。她曾在巴黎旅居了一段时间,最终于1941年来到美国,并于十年之后成了美国公民。在美国成为一名政治学家之

^① Lettre n°15 du 24 mars 1930 de Hannah Arendt à Karl Jaspers, in Hannah Arendt, Karl Jaspers, *Correspondance, 1926—1969*, Payot, 1995, p. 45.

^② Springer Verlag, 1929; trad. fr. Tierce, 1991; rééd. Payot & Rivages, 1996. Voir *infra* note 1, p. 60.

汉娜·阿伦特

后，她撰写了一部关于反犹主义历史与极权主义起源的论著，不过后来又回归到对精神生活的根本性思考上。

阿伦特从一开始便被一种独特的激情牢牢抓住：思想与生命其实是合为一体的。因此，她那表面上曲折动荡、在深层次上却保持统一的思想历程，始终以生命——生命本身以及作为有待阐明的概念的生命——为中心。因为汉娜·阿伦特远非一位“职业思想家”，她只是在自己的生命中进行思考：通过阿伦特所独有的特征，人们也试图发现全体女性的特殊性，比如阿伦特身上的所谓“成问题的”“压抑”，使她无法在纯思想所盘踞的殿堂里自成一家，而只能被困守在身体力行以及与他人的联系中。^①

不过更重要的是，在阿伦特的所有作品中，生命主题始终牵引着她的思想，有效地帮助她探讨政治学历史与形而上学历史，并且得到了全面的升华与完善。

阿伦特愤怒中暗含讽刺的激烈言辞表现出她的忧虑，有时甚至过于悲观，尤其当她断言“极端的恶”起源于康德所谓的“意志倒错”，从而使人显得“多余”的时候：换句话说，过去的和潜在的极权主义者是在消解了一切生命、包括他自己的生命意义之后，再动手摧毁人类生命的。更为糟糕的是，我们的女历史学家坚持声称在帝国主义发展过

① 多种出版物、学术研讨会和杂志专号曾经对汉娜·阿伦特的著作进行研究，值得一提的有：*Social Research*, n°44, 1977; *Esprit*, juin 1980; *Les Etudes phénoménologiques*, n°2, 1985; *Les Cahiers du Grif*, automne 1986; *Les Cahiers de philosophie*, n°4, 1987; colloque de l'Institut italien d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 de Naples, 1987; *Politique et pensée*, actes du colloque du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1988, Tierce, 1989, rééd. Payot & Rivages, 1996; *Hannah Arendt et la modernité*, Annales de l'Institut de philosophie de l'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Vrin, 1992; colloque international, Genève, 1997; t. I, *Les Sans-Etat et le droit d'avoir des droits*; t. II, *La Banalité du mal comme mal politique*, Paris-Montréal, L'Harmattan, 1998.

程中所发现的人类生命的“多余性”并未消失——恰恰相反——在被自动化所占据的现代民主政体中，“极端的恶，可以说，是伴随着一种使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多余的制度而出现的。这种制度的操纵者认为，自己和他人都是多余的，而极权主义刽子手则更加危险，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与死，对自己有没有生存过、有没有出生过都不屑一顾。制造尸体和地牢的危险在于：今天，随着民主普及化，随着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仍然执意要用功利主义的字眼来构建世界的话，民众就会不断被迫沦为多余的人。普天之下的政治事件、社会事件、经济事件，在暗中与使人多余的极权主义机器也就沦为同谋”^①。

面对这一威胁，阿伦特在《人的条件》^②一书中站起来捍卫生命。与消费主义所鼓吹的生机论以及致力于“生命进程”的现代技术平庸地复制生命相反，阿伦特为每次独一无二的出生引吭高歌，因为每一次出生都能开创她所谓的“生命的奇迹”：“这种奇迹拯救了世界，拯救了各个领域的人类事务，也拯救了正常与‘自然’的废墟，因为新人通过出生权所获得的行动能力，最终是在出生率之中实现的，通过新人的出生，通过他们开始新的行动，行动的能力才得以在本体论的层面上站稳脚跟。只有完整地经历过从出生到行动的过程，人类才能获得信仰和希望，而生命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却是古希腊人所不知道的……世界上的信仰与希望或许可以在《福音书》所宣告的‘好消息’中找到最简短而最光荣的表达，‘我们的一个孩子降生了’。”^③

今天，我们很难接受，曾经作为基督教和后基督教民主的具有神

①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卷：《极权体制》，第201页。

② 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1958)，trad. fr. Calmann-Lévy, 1961; rééd. 1983.

③ Ibid. ,p. 278.

汉娜·阿伦特

圣价值的生命，是历史发展到今天的结果，很难想象生命也会受到威胁。而在阿伦特的作品中贯穿始终的，正是对生命的根本价值、生命在基督教末世学中的形成过程，以及生命在现代社会中所蒙受危险的追问——从关于圣·奥古斯丁的“论文”，直到那份没有完成的关于判断力的手稿——除非她已经对这些问题成竹在胸。

第一章

生命是一种叙事





1. 一部“如此坦呈”的传记

在开始描述阿伦特探索生命概念所经历的主要阶段之前,让我们像其他传记作者一样,先回顾一下她生命中的重要时段。^①

正如阿伦特在 1930 年致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人生和作品都很复杂的她之所以能够成为“生命”的“客观化”与“交会点”,一种“坦呈”的存在状况是其决定性条件(我们重新回到《人的条件》^②书中所定义的“条件”上来)。

1906 年,汉娜出生于汉诺威附近的林登,父亲叫保尔·阿伦特,母亲叫马尔塔·考恩。阿伦特家族是“柯尼斯堡的一个古老家族”,女哲学家在 1964 年接受君特·高斯(Günter Gauss)^③的电视采访时曾经提

① Cf. Eliz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1982), trad. fr. Anthropos, 1986; et la monographie de Sylvie Coutine-Denamy, *Hannah Arendt*, Belfond, coll. “Les Dossiers Belfond”, 1994 et Hachette Littérature, 1997.

②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 170—171 页。

③ Cf. Hannah Arendt, “Seule demeure, la langue maternelle” (entretien télévisé avec G. Gauss, 1964), in *La Tradition cachée. Le Juif comme paria*, Christian Bourgois, coll. “Détroits”, 1987, coll. “Choix-Essais”, 1993, pp. 221—254.

到这一点。作为新犹太教教徒以及德国犹太解放团体著名领导人之一赫尔曼·福格尔斯坦(Hermann Vogelstein)的仰慕者,阿伦特家族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表示批判,但是却接待了库尔特·布鲁门费尔德(Kurt Blumenfeld)——未来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布鲁门费尔德在小汉娜的祖父马克斯家里,与她一起玩耍,同时引导她确认自己的犹太身份。汉娜的外祖父雅克布·考恩(出生于现在的立陶宛),把家族企业经营成了柯尼斯堡最大的俄国茶叶进口公司,而在此之前,英国茶叶曾经一直占据着这里的市场。考恩家族还出了许多“宽厚而敏感的寡妇”,比如汉娜的外祖母凡妮·施皮罗·考恩,她热爱斯拉夫服饰,操着一口带俄国腔调的德语,是雅克布的第二任妻子。

保尔·阿伦特毕业于艾伯塔(Alberta)^①,是一家电器设备公司的工程师;马尔塔在巴黎学习了三年法语和音乐,两人都对德国社会党人很热情,拥有成为德国歌德式“有教养的精英人士”的共同理想。在他们组建的家庭里,犹太身份自然得到了确认,尽管基督教文化仍然通过阿达——照顾汉娜的保姆渗透进来。女儿一出生,阿伦特家就准备了一本手册,名叫“我们的孩子”,用来记录汉娜的成长历程,我们可以从中读到马尔塔洞察入微的评论,什么也逃不过这位细心母亲的眼睛:一岁的汉娜“好激动”;一岁半“讲的几乎全是她自己的语言,说话流利。什么都懂”;两岁的汉娜令从事音乐的妈妈失望了,“可惜的是,(汉娜)五音不全”;不过到了三岁,她就能够“就任何主题说话……哪怕不熟悉她的人不大能听得懂(她已经是哲学家了?)”;“特别活跃,总爱冲动;非常热情,甚至对陌生人也一样”;六岁的汉娜“学习轻松,表现出明显的天赋,特别是在数学方面”。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感染梅毒的保尔·阿伦特病情恶化,日子很

^① 加拿大西部省份。——译注

快阴霾起来。保尔年轻时染上了这种病，病情虽然长期较稳定，但女儿出生后两年，再次恶化。1911年，保尔·阿伦特病势加重，病变，运动失调，后来是轻度瘫痪。他因此被迫放弃工作，携全家搬到柯尼斯堡。在那里，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招待。马克斯带着外孙女散步时，运用自己讲故事的艺术，使忧伤的日子有了快乐；当我们在这位女哲学家的笔下发现她赞颂被讲述的生命——传记，而反对生物学意义上的、不能言语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想起了当保尔·阿伦特走向无法逃避的衰竭时，另一位父亲正是用这种讲述故事的魔力，将小汉娜与生命重新联系在一起。

1913年3月，马克斯去世；10月，保尔也走了。马尔塔在《我们的孩子》中记录道：这两次丧失亲人的经历，一次也没能触动汉娜。“她对我说，不该去想悲伤的事，没必要让自己悲伤。这就是她身上典型的对生命的热情。（……）她把这看成是我的悲伤，而她自己却对死亡无动于衷。（……）在葬礼上，她之所以哭泣，是‘因为歌声太美’（她告诉我）……”

这是一个七岁小姑娘的稚气，还是一个已经在思想中展开的生命，知道人可以根据意志进行思考：对于悲伤的事——劝其不要悲伤——也许报以歌声要更好一些？沉浸在思考中的时候，就什么也不会缺失了？当我们读到她对母亲的感想时，确实可以这样猜测：“现在，她又开始想念外公了，谈到他时会带着爱恋和热情，但是她真的失去他了吗？我不这样认为。”思考，难道不是能够与死者生活在一起、避免失去他们、超越哀悼的唯一方式吗？借助于一种包罗万象的思考，我们将在后来汉娜·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向一死一而一生”的暗中争辩中，找到她那种早熟的、对死亡的轮廓勾勒的印迹。她并没有逃避悲剧引起的慌乱，而是开启新的视角，思考出现的公共空间：联系、分享、行动。

可是，暴风雨中暂时的安宁只持续了一年：随着世界大战的到来和少女的生长发育，麻烦便开始了。《我们的孩子》告诉我们，汉娜再

也快乐不起来了：她的牙齿长得乱七八糟，治疗使她感到厌烦；她的书面功课不再像以往那样出色了，甚至连口头表达也变差了——毋庸多言！她敏感易怒，性情乖僻，动不动就大发雷霆！一切都是因为那些反复发作的小病小灾——发烧、流鼻血、头疼或嗓子疼。青春期显然已经到来，而汉娜还没有下决心要变得……像她父亲一样强壮——“像她父亲一样”，马尔塔记录道。很快就会的！

这个八岁小姑娘（1914年）的一句毫不起眼的评论告诉我们，她正在确认男性的身份：“如果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孩子，他可能不认识他的父亲。”汉娜对母亲说道。好奇怪的话语！渴望知道孩子从哪里来，渴望重新认识父母，同时得到他们的承认，汉娜的这一席话暴露出两个女人之间的肉体接触以及她们对缺席的男性的渴望——渴望拥有这个男人，渴望成为这个男人。于是她在两人之间提出问题：如果我们生下一个孩子，他的父亲是谁？既然保尔和马克斯都死了，那个男人在哪儿？谁是那个男人？你？我？一个陌生者？这个男人存在吗？谁能了解？谁能知道？谁能让我们／我生下一个孩子？你？我？没有人？如果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孩子，他可能不认识他的父亲：谁是那个父亲？在两个女人之间，隐约出现了一种“包含”男人的紧密的同谋关系。以至于1927年，这对母女“伴侣”共同庆祝了结婚纪念日——马尔塔—保尔夫妇结婚25周年纪念日。而此时，21岁的汉娜正在准备博士论文。

1920年，马尔塔与商人马丁·贝尔瓦尔德结婚。马丁的前妻去世了，留有两个女儿：克拉拉和埃娃。汉娜与继父一家，特别是与继父的关系愁云密布。由于爱“离经叛道”，她选择了逃避：青春的活法，是否就是将欲望和友谊混杂在一起？对友谊的热忱使她与安娜·门德尔松（Anne Mendelssohn）（作曲家菲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的后代，菲利克斯的祖父是犹太人社会文化解放阵线主席、启蒙运动领袖摩斯·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走到了一起。安娜的

男友是恩斯特·戈鲁马赫(Ernst Grumbach)，这个小伙子年长汉娜五岁，在海德格尔门下听课，他把自己对马堡那位杰出教授的热情传递给了汉娜。几年之后，安娜把拉赫尔·瓦伦哈根(Rahel Varnhagen)的珍贵作品赠送给她的女友，而汉娜·阿伦特正是据此写作了《生命》。

与此同时，汉娜活跃的智慧与博学还吸引了许多朋友。可是，由于和一位中学老师闹矛盾，她竟然被学校开除！母亲一如既往地站在女儿一边。不过，这位滋事的学生必须通过高中毕业考试，作为校外考生，她于1924年(比原来的班级提前一年)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获得了印有普鲁士阿尔贝公爵一世头像的金币。这时，安娜动身去了阿伦斯坦，于是，汉娜便成了恩斯特·戈鲁马赫的女友：这不仅成了当时外省传闻的焦点，但与此同时——生命，又是生命！——也得到了美化和绽放。母亲知道这件事后，并没有反对——汉娜·阿伦特接受高斯采访时，将自己的母亲描述为“特殊的犹太人”的代表，因为她能够“置身于一切社会关系之外”，并且“杜绝偏见”。^①由此，我们应该对阿伦特关于犹太人的“无世界论”^②的观点刮目相看了：他们没有土地，缺乏政治观念，但却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热情”，可惜以色列建国后，这种热情已经濒临消亡。^③

在柏林，这个醉心于克尔恺郭尔、研习神学的女生很快就碰到了一个矛盾：“作为一个犹太人，应该怎样研究神学呢？究竟应该如何入手呢？”她对高斯坦白道：“我想不出任何办法。”因此，她决定去听全国各大高校的一切有趣的哲学课，其中包括马堡大学的海德格尔所开设的课程。“新闻报道介绍得很简单：思想重获生机，使人们以为已经死去的、过去的文化宝藏开口说话了，这就是他们介绍给我们的，与人们

^① Cf. “Seule demeure la langue maternelle”, art. cit., p. 248.

^② 否定上帝之外有世界存在的哲学观点。——译注

^③ 参见本书第二章。